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中国面临的挑战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感受到变革的气息：从内部来看，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阶段，封闭保守成为主要的社会心态。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趋势反映在学术上，则是提倡人性解放和平等的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从外部来看，明清之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酝酿和初步发展时期，西方使团和传教士以学术为先导，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开启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先声，影响和启发了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动摇了封建专制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实行禁教和闭关政策。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国势日趋衰微，社会发展日益停滞，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时期。禁教与闭关政策对西方国家的早期殖民活动和侵略企图起到了某种遏制作用，但它阻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使中国还处于摇篮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因缺少经济动力而难以顺利成长，使中国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 一、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

### （一）传教士来华起止时间和人员概况

在古代，中外文化即已开始进行交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

国后，历经一千多年的曲折，在同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学和道家互相排斥又相互吸取的过程中，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道佛的合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伊斯兰教是另一种情况。自唐以降，伊斯兰教东渐，对我国十个少数民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但影响到其心理状况和精神世界，而且影响到其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命运则很为不同，它虽然也曾几度传入，几度兴盛，但它仅限于在上层传习，没有在民间扎下根，极易为上层态度的变化所左右，难以获得持续的发展。

基督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影响不大。元代时经陆路第二次传入，称也里可温教，皇室成员多有信奉。因元朝灭亡，奥斯曼帝国兴起于西亚，东西方陆路交通受阻，基督教向东方的发展中断了 200 年。到 16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海上通道，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到中国。早期来的有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他们坚持武装传教，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但当时他们并不具备同中国抗衡的武装力量，因而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因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而收效甚微。

16 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壮大，新兴的市民阶级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感，他们感到，教会的神权统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遂发动了反对教皇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由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否定了教皇和教会在解释教义方面的权威，很快就在北欧各国广泛传播开来。在南欧各国，天主教会实行了内部革新，试图将教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工具。耶稣会即是天主教会内部革新的主要依靠力量。它创立于 1534 年。除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外，耶稣会还十分重视创办学校，培养博学的牧师，以知识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并派遣

教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亚洲。

在中国，耶稣会采取了与其他教派不同的策略。他们不赞成以武力方式传教，而主张采取迂回、温和的方式，因而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552年，耶稣会第一个赴华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抵达广东上川岛。1582年，罗明坚首次到达中国内地。但真正在中国打开局面的是利玛窦。

利玛窦（1552—1610年），号西泰，意大利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就学于耶稣会书院，后进入罗马神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利玛窦在研习神学的同时，还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掌握了多方面科学知识，尤其对数学有较深的造诣，因而既是虔诚的教士，又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这个特点为他日后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1578年，利玛窦从欧洲到达印度果阿，1582年在澳门学习中文，次年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1596年，利玛窦就任耶稣会首任中国会长。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参与了译书、修历、绘制地图、传教、修筑教堂等活动，大大推动了西学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

和利玛窦同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敬、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各地开展学术交流和传教活动。

在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汤若望和南怀仁。

汤若望（1591—1666年），字道味，德意志人。1611年入耶稣会，1622年和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同时来华，先后在北京、西安等地学习和传授教义。明末曾参与修历工作，并帮助明朝政府铸造西式火炮。清初因所编历法测时准确，得到顺治的信任，出任钦天监正。康熙初年因受杨光先诬告而去职。1666

年在北京病故。

南怀仁（1623—1688年），比利时人。汤若望被免职后，杨光先继任钦天监正，但他不懂历法，所编历书有很多误差，测时不准，遂为南怀仁所取代。南怀仁因制造天文仪器，督造西方新式大炮平定三藩之乱等功绩，升任太常寺卿和工部右侍郎。1676年，南怀仁出任中国教区副区长。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相继派遣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刘应、雷孝恩、马若瑟、巴多明、蒋友仁、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传教士来华，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

雍正以后，由于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激化了清政府与教皇之间的矛盾。1724年，清政府颁布禁教令。此后，在华传教士人数急剧减少，除了内廷和钦天监尚留有少数教士工作外，各地教士都迁往澳门，教堂关闭，传教活动停止，中西学术思想的交流也基本中断。

## （二）以学术为先导的传教活动

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有完整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住脚，并扩大影响，是很不容易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融合，吸收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完成了中国化，才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在利玛窦之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了解这个特点，他们企图将西方的宗教原封不动地传入中国，均遭到失败。

利玛窦吸取了前人传教失败的教训，针对排外心理浓厚的社会状况，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办法：第一，走上层路线，争取官僚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第二，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遵循中国的礼仪风俗，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儒家的圣人、经义比附天主教，以减少传教的阻力；第三，以学术为媒介，借助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

和艺术，吸引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上都按照这种方法行事，逐渐打开了局面。

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竭力结交各级官吏，向他们赠送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西方珍奇物品。1583年，他们到达广东肇庆，谒见知府，按中国习俗行跪拜礼，声称他们是“侍奉天地真主的修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西洋航海而来”<sup>①</sup>，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士绅的敬重。1589年，利玛窦迁往韶州，继续与上层人物广泛交往，结识了苏州人瞿太素。1595年，利玛窦到达南昌，与建安王相识，撰写了《与建安王论友》一文，献给建安王，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601年，利玛窦与庞迪我、熊三拔等传教士到达北京，向明神宗进赠礼物。当时明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神宗希望在开发财源、改良兵器上得到传教士的帮助，便召见了利玛窦，待以上宾之礼，破例允许他们在北京居留传教。很快耶稣会便吸收了很多上层人士入教，包括宗室、太监、显宦、贡士、举人、秀才等，著名者有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寺卿李之藻、吏部给事中瞿式耜等。到清朝初年，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担任了朝廷大臣。他们出入宫廷，主持修历，具有了影响皇帝、结交大臣、传播西方学术和宗教的更为便利的条件。

为了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耶稣会传教士在行为举止的中国化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他们注意顺应中国的礼俗，取中国人的姓名，“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sup>②</sup>。利玛窦等人初入中国时，穿西方僧服，后听从瞿太素等人的建议，改穿儒服，以利于结交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潜心研究中国的经史典籍。利玛窦在《上神宗疏》中称自己“颇知中国古圣先贤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在了解

<sup>①</sup> 《天主教十六世在华传教志》，第 242 页。

<sup>②</sup>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 19 页。

了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意识形态后，传教士感到，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必须利用中国的传统。因而他们尊重中国人祀天、祭祖、尊孔的习惯和纲常名教的伦理观念，并借用孔孟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利玛窦写作了《天主实义》一书，宣称西方的天主就是中国圣贤所说的上帝，也即中国人所说的天。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不是否定中国的圣经贤传，只是对之作些补充而已<sup>①</sup>。艾儒略、南怀仁、白晋、孙璋等人的宣教著作也引用了儒家典籍，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人的天同出一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古代儒学，鄙薄当代儒学。这种做法既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基督教教义“多与孔孟相合”，易于引起共鸣，接受基督教，也使某些企图以复兴古代传统儒学精神来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抱有好感。

### （三）传教士译介的西方学术

利玛窦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扎根于中国，必须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为此必须借助人不同文化体系中比较易于沟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并以中文著书立说，使西学为中国人了解和欣赏，以便逐步扩大教会的影响。因此传教士到中国后，“不徒恃传教为生”，而是广泛结交中国学者，大规模传播西方文化。

在学有专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耶稣会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学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文学。利玛窦 1607 年著《乾坤体义》，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汤若望著《历法西传》，引用了托勒密、第谷、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理论。蒋友仁著《坤舆图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还协助徐光启、李

<sup>①</sup> 《天主实义》，上卷，第 2 篇，费赖之著，《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 156 页。

之藻修改历法，运用比较先进的数学知识和精密的天文仪器，完成了《崇祯历书》，它比中国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更准确。当时朝廷曾“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sup>①</sup>。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这个历法。

数学。数学在西方被视为科学之王。利玛窦来华时带来很多西方数学书籍，并与中国人合作译出了若干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及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几何原本》是古希腊哲学家欧几里得撰写的平面几何著作。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注重实用，只有平面图面积、内外切圆、平行线等内容，缺少抽象的公理体系，表达方式也不甚精密。《几何原本》则以充分公理化的内容丰富了中国的几何学，完善了表达方式。该书所确定的点、线、角等专用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它所包含的形式逻辑思想，带来了中国所少的认识方法，有助于中国近代科学观的成长。《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的算术知识，传入了比中国固有的“筹算”和“珠算”更为便捷的西方笔算法，即整数与分数的四则运算。它所介绍的“以减试加”、“以除试乘”的验算方法，补充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缺门。

物理学。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的取水蓄水之法。徐光启利用该书，并结合中国原有的水利知识，完成了他的《农政全书》中有关水利的部分。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徵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的原理及简单的机械制造方法。汤若望在《远镜说》中介绍了西方的光学。南怀仁根据意大利科学家勃朗伽的设想，试制了蒸汽机车。他们还撰写了有关火炮制造和使用的书籍，如汤若望的《火攻挈要》，南怀仁的《神威图说》。明朝末年，汤若望为明

<sup>①</sup> 《明史·历志》。

政府铸造西洋红衣大炮（亦称佛朗机炮）抵御清兵。清初，南怀仁也帮助清政府铸造西洋火炮，以平定“三藩之乱”。

地理学。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五大洲的概念。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仅及东非、北非和西欧，经过利玛窦的介绍，南非、南北美洲和南极洲的概念传入中国。该书还介绍了寒温热五带的划分和地圆学说，使得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庞迪我著《海外舆图全说》，介绍了外国地理风情。艾儒略则据此撰写了《职方外纪》，其中有世界地图及对各国地理情况的解说，“所记皆绝域风土，为自古域图所不载”<sup>①</sup>，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这些地理知识有助于中国人突破原有的地域视野，形成较为开阔的世界观念。

医学。邓玉函著《泰西人身说概》，由毕拱辰译为中文。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等人著《人身图说》。这些书详细介绍了人体的结构、形态和生理器官等。熊三拔著《药露学》，介绍了西药的制造技术。

神学、哲学和艺术。利玛窦等传教士撰译了一批神学著作如《天主实义》、《畴人十篇》、《二十五言》、《辩学遗牍》、《圣教实录》等。傅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卫匡学著《中国文法》。这些著作作为外国人掌握中国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有助于中国人形式逻辑思维的进步，有助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觐见明神宗时，送给他西洋油画和西洋琴，还演奏了自己创作的《西琴八曲》，把西方油画和西方乐器传入中国。

纵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不但有欧洲的科技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识，有文艺复兴后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也有近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尽管传教士为宗教目的所限，没有完整准确地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和哲学，但仅就他们所介绍的内容来看，也是很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和采纳的新鲜学问。这些西方学术属于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学术体系，它们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极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明末清初中国科学的一度繁荣，与当时中西学术的直接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 二、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求知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的衰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某些新的经济因素，即东南地区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乃至开明君主，也开始对传统学术感到不满足，他们很自然地异质的西方学术所吸引，对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产生了很大兴趣，渴望从中得到走出社会危机的启迪，并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找到一条新的富强之路。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代表人物，也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增强统治基础，巩固国防，维护皇权和大一统。因此，他们也对引进西学，学习西方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主动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和康熙皇帝。

徐光启（1562—1633年），上海人，明末大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晚明提倡和主持西学输入的杰出人物之一。1596年，他在韶州结识耶稣会士郭居敬。1600年，他在南京与利玛窦相会，“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sup>①</sup>。1604年，徐光启进北京，向已定居于此的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并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晚明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研究、介绍西方科学的学派。

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徐光启集》，卷2。

徐光启曾经受洗为天主教徒，其原因，固然在于他认为基督教义与儒学宗旨相合，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更好地学习西方的科学。他认为，西方学术不但有助于“国家致盛治，保太平”<sup>①</sup>，而且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所未闻”的新学问，它的范围“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宗根”<sup>②</sup>，包罗万象。其“格物穷理之学”，如天文、历法、律吕、数学、地理等等，更是补“开辟所未有”，理应效仿。这种对外域文化的开明态度，一反用夏变夷的封闭保守心理，反映了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求知若渴的精神风貌。正如徐光启所说，向西方学习，可以“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sup>③</sup>明确地将博采西方先进文化看做使中国富强的必要途径。虽然他在这里也表现出某些华夏中心论的陈腐观念，但毕竟是把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的主张鲜明地提了出来，这在将外族外国看做蛮夷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同时，徐光启对西方的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效仿，而是立志赶超，提出了分两步赶超的设想，即所谓“先行会通，进而超胜”。第一步，了解和掌握西学。为此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并亲自参与其事。他认为对西方学术不应停留在单纯的引进，而应将西学与中学参核互证，推求同异，以达到“会通归一”，创立综合中西的新学术。因而他在《测量法义》等著作中，用《几何原本》中的基本定理对中国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的勾股部分加以解释和补充。第二步，在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力求超过西方学术水平。为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在领导历局时，专门从钦天监调来一批中国学生，让他

徐光启：《辩学章疏》，《徐光启集》，卷 9。

徐光启：《修议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徐光启集》，卷 7。

徐光启：《简平仪说序》。

们参与观测和修历的实践，计算辅助用表，希望他们在干的过程中掌握西学。在用编译的课本向学生传授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循习晓畅”，掌握西学的精华，而且“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sup>①</sup>。表现出早期启蒙学者在学习西方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徐光启不能改变明末的政治腐败和改朝换代的历史趋势，但他努力会通中西学术的思想和行动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借鉴。

康熙（1662—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提倡，促进了清初的西学输入和科学发展。

康熙即位前后，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历法的争论。对于依西法编制的时宪历与中国的旧历孰优孰劣，汤若望与守旧派大臣杨光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鳌拜等人支持下，杨光先占了上风，汤若望被免去钦天监正一职，由杨光先接替。由于旧历与天象屡屡不合，康熙令南怀仁与杨光先同时观测天象，结果证明南怀仁的推算正确，而杨光先的推算谬误百出。康熙遂废除旧历，重行时宪历，让南怀仁重返钦天监。通过这场斗争，康熙对天文、历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师从南怀仁，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康熙学习西学的范围很广，涉及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药理学、解剖学、拉丁文、欧洲哲学、音乐理论、绘画等学科。他尤其重视数学和天文学，《几何原本》一书他读过几十遍，甚至因用功过度而吐血。他经常观测天象，进行数学推算，并利用所学到的西学知识治理黄河泛滥。他还组织科学家编写了有关天文、数学和乐理的丛书《律吕渊源》。

康熙十分重视西方的人才，除了在传教士中征募，还派人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徐光启集》，卷8。

去欧洲招聘。他大胆地使用西方科技人才，这些人为平定叛乱、发展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南怀仁在“三藩之乱”时为清廷铸造西洋火炮，并制造了天球仪、简平仪等多种天文、气象仪器。传教士还参核中西数学知识，编写出《比例规解》、《借根方算法节要》等十余部满、汉文数学书籍，并制作了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等计算工具。

明清之际，在徐光启和康熙皇帝等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之下，中国涌现出一批了解西学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如李贽、方以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王锡阐、梅谷成等。西方文化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方以智与汤若望交往频繁，多次与之探讨天文学。他在传统自然观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的命题，表达了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相互关系的科学哲学观。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的数学和逻辑学著作，将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传入中国。梅文鼎多次与殷铎德交流历法知识。梅谷成在西方数学“借根方”的启发下，重新发现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建立高次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中西学术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复兴，使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在一度消沉之后，从晚明到清初，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产生了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等杰出科学家。

同时，西学也直接或间接启发了中国的思想界，促使早期启蒙思想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若干具有近代特征的思想命题。李贽在 72 岁高龄与利玛窦会面，交谈哲学。他能够提出和中国传统民本平等观不同的人类天赋平等的思想，或许就从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得到过某些启发。王夫之针对盲目虚骄自大的“华夏中心说”，提出了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文化中心多元论”和“文化中心转移论”的命题。黄宗羲

认真而系统地研究了由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权力制衡思想。在此基础上，明清之际产生了以人性解放和天赋平等为核心的早期启蒙思潮，它批判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特征的程朱理学，动摇了禁锢人心的封建伦理纲常观，促使一批有识之士走出羁绊知识分子的象牙塔科举制度，转而从事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探讨国家兴衰、社会进步的道理，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作了必要的铺垫。

### 三、两次英国使团的失利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英国两次派遣使团访华，想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然而他们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1792 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子爵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产业革命，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为了推销英国商品，炫耀英国实力，马戛尔尼带来了许多展现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 110 门大炮的英国最大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等。马戛尔尼试图以此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获得对其地位的尊重，并建立符合英国愿望的通商关系。

1793 年，英国使团到达中国，马戛尔尼赴热河拜见乾隆皇帝，向乾隆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第二，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第三，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住；第四，中国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贮货和居住，并许可英

国人在此处活动自由；第五，减免英商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及珠江运货的税额；第六，中国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若征收，对税项和税额应有明确的规定。清政府严词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这次使团的领导人是阿美士德勋爵。同年6月，阿美士德使团抵达中国。因为礼仪问题，中英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清廷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最高的君主，坚持要阿美士德使团按中国礼节对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阿美士德只同意按英国的礼仪觐见。嘉庆一怒之下，拒绝接见英国使团，令其立刻离开北京回国。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中国人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中国皇帝及中国宫廷斤斤计较的，是英国使节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是否向中国皇帝行跪拜或叩头的礼节，而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却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中英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和由此所体现的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奋起直追，而是把它们看做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英国科学家在安装调试天体运行仪时，屡屡遭到围观中国人的哄笑；乾隆皇帝在参观英国的天文学表演时，只看了几分钟，就刻薄地评论，“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英国科学家表演帕克透镜如何熔化中国的钱币时，在现场观看的中国大臣却用它来点烟斗；英国炮兵想在圆明园为中国人演射野战炮，中国官员却对他们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什么新东西，拒绝了其要求。严肃的科学演示被中国人当作“杂耍”和“巫术”，高科技礼品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在圆明园，等待着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的再发现。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绝好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对此，不仅

当时的英国人感到十分惊讶，也使 200 年后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如何解释这种轻蔑态度的原因呢？从乾隆某个儿子的话中可以得到某种启示。他在观看了英国的科技演示和工业产品后，不以为然地反问：这些东西难道是“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想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实现英国资产阶级扩张市场的愿望。当时，英国的军事力量还不占有明显的优势，难以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不得不借助谈判的方式。由于清廷的无知和自大，以及英国使团的骄傲和不尊重中国的礼俗，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愿望没有实现，中国的大门也依然紧闭。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天文仪器、机器枪炮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好奇心，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研究、模仿、改进与创新。英国两个使团灰溜溜地回国了，这固然是英国人的失败，但对中国而言，也未尝不是进步良机的丧失。在中国人对西方近代科技的哄笑声中，我们品尝到了某种苦涩。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创造出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的中国人，面对着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迥异的西方近代科技，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呢？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明清以来中国科技水准的下降不无关系。对于明清科技水平下降的原因，历来的研究者多从制度与需求的角度进行探讨，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好奇心之有无大小，是一个更实际也更有心理问题。事实上，自从实行科举考试以来，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好奇心就遭到了日益沉重的压抑与扼杀，明清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在科举制度之下，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引导着千万学子的大脑。在学习时，学生的心思才

力都用在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和僵死的八股形式；在考试时，考生也必须按照儒家经典的既定答案和皇帝的圣谕广训来回答，不得越雷池一步；即使侥幸考中，为官者大多也只对权术和统治术感兴趣，即乾隆的儿子所谓“统治国家的科学”。只有偶尔从科举“正途”游离出来的极少数人，如李时珍、徐霞客等，才能保持正常人的好奇心，关注和研究自然科学，而多数学子，在“不务正业”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光宗耀祖”的功名心驱使下，无暇也无心旁骛外求。久而久之，知识分子的功名心日盛，好奇心日薄，逐渐失去了思考与创造的能力，造成了中国人科技能力的下降和中国科技水平的萎缩，不但危及科学的进步，而且损害了民族的生机。

#### 四、从开放到封闭的历史教训

从晚明到清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展，出现了科学复兴、思想启蒙、人才辈出的局面。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跟上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潮流，使中华民族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转瞬即逝。

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清政府实行禁教和闭关政策。中西学术思想的直接接触和交流中断。

禁教与闭关的直接原因，是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耶稣会士来华初期，利玛窦等人为了深入中国社会，采取了天主教中国化的方法。他们尊重中国人祀天、祭祖、尊孔的习俗，博得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明末到康熙晚年，中国境内建立的天主教堂近 300 座，受洗的教徒近 30 万人。但在罗马教会内部，对在华传教士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1704 年，罗马教皇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派遣铎罗为特使，到中国传达教皇的命令，禁止中国教徒祀天

祭祖尊孔。其要点有三：第一，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第二，不准在礼拜堂内悬挂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第三，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这就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和愤怒，他逮捕了铎罗，把他押送澳门监禁。1715年，教皇重申禁令，并于1720年派特使嘉乐赴华再次传达教皇命令，在华的传教士不得不服从。由此导致了罗马教廷与清政府关系的彻底破裂。雍正继位后，于1724年颁布禁教令，除了少数在钦天监和内廷供职的教士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并关闭了教堂。中西文化学术交流遂告中止。1757年，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只限广州一口通商。中西经济交流也就此裹足不前。此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迅速消退。

西方文化未能持久深入地影响中国社会，与传教士的活动方式和传教宗旨也有很大关系。传教士取得成功的某些因素，也正是使其影响不能持久的原因。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主要是自然科学，他们抱着传教的目的，因而对欧洲正在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近代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很少介绍。在缺乏近代哲学科学世界观引导的情况下，西学以理喻人的深度和力量显得十分不够。传教士在介绍西学时，侧重于具体学科的引进，认识论方法论的介绍则相对不足，因而西学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阴阳对立同一为特征，重视量变灾变，忽视质变，缺乏时间维度的朴素自然观，难以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哲学指导。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西方近代启蒙思潮的介绍，更使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时，难以完整系统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即使对天文学和数学等具体学科的介绍，传教士也以是否达到传教目的为转移。例如利玛窦只肯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没有答应徐光启译完全书的要求。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时